

忠实原则与诗歌翻译的风格变异： 以《飞鸟集》三个译本为例

刘海涛 方 昱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飞鸟集》是一部近似英文自由诗的格言诗集。选取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及自建诗歌语料库为参照语料库,考察郑振铎、冯唐、陆晋德三个译本,聚类分析显示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郑文”与爱情小说最为相似,而“冯文”和“陆文”与侦探小说最为相似。风格变异的原因可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汇和词汇丰富度探求:第一,“郑文”倾向选择一个固定表达对应某个英语词汇,“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第二,“郑文”和“陆文”基本准确传递了原作意义,用词风格符合原文,且遵循了原文不押韵的特点。“冯文”基本表达了原作意义,但有时由于过分追求表达的简练和押韵,存在错译、漏译。第三,“冯文”的词汇丰富度高于其他两个译本,“郑文”的词汇丰富度最接近原文。研究还发现,译本越忠实于原文,其接受度也越高。

[关键词] 《飞鸟集》; 诗歌; 翻译; 忠实原则; 风格变异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受译者翻译思想、教育背景、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译作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名著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译本,因此,如何选择质量高又适合自己的译本尤为关键。以前对译作的评价大多是主观的,同一部译作不同的人评价会有不同的结论。以忠实原则为出发点,本文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探究译本的风格变异问题。

一、文学翻译的忠实原则

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表述的“信达雅”被视为翻译的一条重要原则,但由于严复未对其做进一步阐释,该原则自提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和质疑,引起不少争论。一些学者对“信达雅”进行解构,或对其中一个翻译原则提出批评^[1-2],或辩证分析三者的地位^[3-4];还有一些学者讨论该原则在当今是否仍然适用^[5],多数学者认为这三字仍有生命力,将继续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作用^[5-6]。纵观这些争论,大家达成了如下共识:“信”是翻译的首要原则,“达”和“雅”应该以

[收稿日期] 2016-09-0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7-05-31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8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1. 刘海涛(<http://orcid.org/0000-0003-1724-4418>),男,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博士,主要从事计量语言学、语言复杂网络、配价理论与依存语法、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2. 方昱(<http://orcid.org/0000-0003-4931-8389>),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计量语言学、依存语法等方面的研究。

“信”为前提^[7-8]。

除“信达雅”外,还存在很多文学翻译评价标准:有强调“神似形似”的,有追求“化境”的,亦有“意译直译”之说。尽管这些原则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侧重各有不同,但不难发现,它们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翻译应忠实于原文,这是“文学翻译的绝对标准”^{[9]88},也就是说忠实是翻译实践中“不变的衡量准则与实际操作中最可行的遵守原则”^{[10]56}。文学翻译中的忠实包括词语语义、词语修辞色彩、句法逻辑、句法结构、行文风格、艺术形象等^{[2]66},体现在“对原文的理解、对风格的再现、对音韵的追求”^{[11]36}等方面。

传统上对翻译忠实的研究或分析典型词汇^[12-13],或结合译者的教育背景和翻译意图分析翻译策略^[14]。这些方式固然能深刻理解译文,却缺乏对译文的整体把握。语料库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途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此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15-16],由此开启了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Ji 以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LCMC)和浙大汉译语文学语料库(ZCTC)为参照语料库,以词性为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的两个中文译本,发现它们不仅存在风格变异,这种风格变异最终还引起了体裁转变:一个译本接近侦探小说,而另一个译本接近爱情小说^[17]。

风格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不同视角出发会有不同的界定。本研究将风格分为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原作风格由“作者的用词立意”^{[18]118}决定,具体表现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18]118},所谓原作风格实际上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19]47}。译作风格则是译作本身以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体现原作内容,是“另一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19]47}。风格变异指译作风格偏离原作风格,可反映译作对原作的忠实程度。然而,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只是相对的,由于“原语和目的语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20]29},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都不可能和原著绝对一致。风格变异难以回避,但译者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这种转变,转变越小,便意味着对原文越忠实。已有研究表明小说翻译中存在风格变异和体裁转变^[17],那么这种变异是否同样会出现在诗歌翻译中?如果译者能准确理解原文、尽力再现原文风格并保持原文的韵律特点,是否能把风格变异降到最小,是否也就意味着译文更符合忠实原则?

本文以《飞鸟集》及其三个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从译本风格来看,《飞鸟集》三个中文译本是否遵循了忠实原则?三个译本是否存在差异?(2)如果风格变异存在,原因有哪些?(3)译本忠实度是否会影响译本的可接受度?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 1916 年,包括 325 首无标题小诗,其中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诗集《碎玉集》,还有一部分是诗人 1916 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由郑振铎于 1922 年翻译,此后,徐翰林、吴岩、陆晋德等人也都翻译过该诗集,但一般认为最好的仍是郑译本。2015 年 7 月,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上市,同年 12 月 28 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宣布全部召回,《飞鸟集》各译本再次引起公众热议,特别是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

公众的看法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冯唐译本“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如将 mask 译为“裤裆”、将 hospitable 译为“骚”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他们认为,“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21]。另一派则力挺冯唐,主要以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为代表,她在博文中称冯唐的翻译“全部都符合‘信’的标准,在诗意上还胜过此前公认最好的郑振铎译本”,所以冯译《飞鸟集》“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①。

①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wa86.html, 2016 年 9 月 9 日。

由此可见,双方分歧主要在于冯唐译本有没有做到忠实原文。尽管他们都列举了相关例句佐证自己的观点,却没有从译本整体考虑,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本文试图结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首先利用聚类分析确定译本是否发生了风格变异和体裁转变,比较三个译本是否存在差异,然后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和词汇丰富度三个角度分析原因。除郑振铎译本(新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和冯唐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外,我们还选择了陆晋德译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风格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22],词长、高频词、句首名词、型例比、词性等都可作为衡量风格的指标^[23-25]。Shah 和 Bhattacharyya 选取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中五个文本类型,研究得出使用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可以最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文本^①。Zhang 以 LCMC 中 15 个文本类型为研究对象,根据其词性标注体系确定了 60 个指标,发现不同文本类型有不同的词性使用偏好^[26]。由此可见,词性能有效区分英文和中文的文本风格并进行文本分类,因此,本文将选择词性作为定量分析的指标。

为探究《飞鸟集》原文及其译本风格,首先,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参照语料库。一方面,语料库要包含多种体裁的文本,且中英文语料库拥有对应体裁;另一方面,语料库还需要对原始语料进行词性标注。为此,我们选择英国书面语语料库(FLOB)和 LCMC 分别作为英文和中文参照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的建库标准类似,都包含 15 个子语料库:新闻报道、社论、新闻评论、宗教、操作语体(包括技术、商贸类文本)、流行读物、传记和散文、报告和公文、学术和科技、一般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西部和历险小说(武侠传奇小说)^②、爱情小说和幽默。按照参照语料库词性标注的方法,我们用 CLAWS^③对《飞鸟集》原文进行词性标注,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ICTCLAS^④对三个中文译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人工校对后分别建立了“《飞鸟集》原文”语料库及“郑文”、“陆文”和“冯文”三个译文语料库。由于 FLOB 和 LCMC 没有诗歌子语料库,我们选择英文自由诗和汉语新诗分别进行词性标注,建立英文诗歌语料库和中文诗歌语料库作为补充。随后以 10 000 词为标准,统计了原文及其参照语料库所有实词^⑤的使用频率,译文及其参照语料库 59 种^⑥词性的数据,并进行聚类分析。中文选取的 59 种词性见表 1。

表 1 中文译本分类词性列表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名词	N	副动词	vAV	“他”	3m	“为”	wei
名词性语素	n	介词	P	“她”	3f	“以”	yi
名动词	vN	后置词	POST	“我们”	1p	“所”	suo
名形词	aN	连词	CON	“你们”	2p	“于”	yu/
人名	PER	量词	CLAS	“他们”	3p	“与”	yu_

① C. Shah & P. Bhattacharyya, "A Study for Evaluating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PO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I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niversal Knowledge and Languages, Goa, India, 2002.

② LCMC 将 FLOB 中的“西部和历险小说”改成“武侠传奇小说”,因为汉语中没有对应的体裁。

③ 可通过网站 <http://ucrel.lancs.ac.uk/claws/trial.html> 免费在线使用。

④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可从 <http://ictclas.nlpir.org/> 下载使用。

⑤ CLAWS 在进行标注时对实词又进行了细分,最终四类实词被分为 134 种词性。

⑥ 因为未找到 ICTCLAS 1.0 版本,为和自建语料库保持一致,本文使用的 LCMC 是后来用 ICTCLAS 2008 重新标注的升级版,其中没有省略词的标注,故为 59 种词性。本文所说的词性指 CLAWS 和 ICTCLAS 中细分出来的词性,如名词又可细分为名词、人名、地名等。

续表 1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词性	缩写
名词+名词	NN	习语	IDIOM	“的”	deN	“之”	zhi
动词	V	前缀	PRE	“地”	deV	“进行”	jx
动词性语素	vg	后缀	SUF	“得”	Vde	问号	?
动词叠词	VV	时间	TIME	“将”	Jiang	感叹号	!
形容词	ADJ	地点	PLACE	“被”	bei	冒号	:
形容词性语素	ag	状态词	DESC	“把”	BA	分号	;
定语形容词	ATTR	小品词	PART	“使”	sh_	书名号	《》
副词	ADV	拟声词	ONO	“了”	le	括号	(
副词性语素	adv	“我”	1s	“着”	zhe	顿号	,
副形词	ajAV	“你”	2s	“过”	guo		

由于 Shah 和 Bhattacharyya 以及 Zhang 的研究均没有涉及诗歌,为进一步确认这些指标同样适合于诗歌,我们首先选择几首具有代表性的中英文诗歌进行聚类分析,选取的诗歌见表 2。

表 2 中英文诗歌列表

中文诗歌	英文诗歌
冰心《纸船》	Pound <i>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i>
何其芳《预言》	Yeats <i>When You Are Old</i>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Frost <i>The Road Not Taken</i>
李广田《地之子》	Eliot <i>Morning at the Window</i>
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Hughes <i>Dreams</i>

聚类结果显示,所选五首中文诗歌与自建中文诗歌语料库最接近,欧式距离平方和为 9.74,同样,所选五首英文诗歌与自建英文诗歌语料库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也最小,为 21.885。这说明本文所选词性指标对诗歌同样有效。

三、忠实原则与风格变异

《飞鸟集》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8]115},共收录 325 首无标题小诗,因其“没有格律、音节、韵脚的限制”^{[27]48},通常又被看作散文诗的代表。为探究原文和译本是否发生了风格变异,我们需要借助一种典型的探索性分析手段——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根据某一标准对样本合理分类,归为一类的样本间有更大的相似性。这里,我们选择欧式距离平方和作为分类的标准进行聚类分析,也就是分别计算原文与 FLOB 的 15 个子语料库、英文诗歌语料库对应词性频率差异的总和,以及 3 个译本与 LCMC 的 15 个子语料库、中文诗歌语料库对应词性频率差异的总和。其值越小,表示两个语料库间的相似度越大,风格便越接近。换句话说,通过观察原文、三个译本与哪个参照语料库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我们便可以大致认定其风格。聚类分析的结果见表 3。

表3 聚类分析结果

体裁	《飞鸟集》原文	郑文	冯文	陆文
新闻报道	31.492	13.956	11.095	9.323
社论	35.796	14.035	11.426	9.215
新闻评论	30.843	14.896	12.436	10.671
宗教	20.821	14.017	14.536	13.710
操作语体	22.807	13.764	11.670	11.038
流行读物	24.937	11.592	9.568	8.164
传记和散文	26.804	11.520	9.675	8.443
报告和公文	29.904	22.989	19.541	17.646
学术和科技	33.346	15.263	14.328	13.017
一般小说	35.525	11.622	9.461	8.193
侦探小说	39.248	11.796	9.217	7.920
科幻小说	22.114	11.498	10.362	9.854
武侠传奇小说	30.552	12.783	10.339	9.715
爱情小说	33.831	10.870	9.494	8.168
幽默	31.609	15.259	12.970	9.145
诗歌	19.688	10.932	9.631	12.100

由表3可知,“《飞鸟集》原文”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为19.688,说明《飞鸟集》的风格最接近于诗歌。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飞鸟集》原文”与宗教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为20.821,仅略高于诗歌,这是因为“泰戈尔深受印度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影响”^{[28]84},所以其诗作又带有宗教色彩。

三个中文译本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均不是最小,这表明译本在词性选用上和诗歌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最终引起了译本的风格变异。“郑文”最接近爱情小说,欧式距离平方和为10.87,其次为诗歌,距离为10.932,这说明尽管“郑文”发生了风格变异,但仍有接近诗歌的倾向。“冯文”与侦探小说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为9.217,其次为一般小说、爱情小说、流行读物,然后才是诗歌。“陆文”同样与侦探小说的欧式距离平方和最小,为7.92,而其与诗歌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为12.1,位于流行读物、爱情小说、一般小说等之后。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但“郑文”发生的变化最小,“陆文”的变化最大。另一方面,三个译本均没有体现出和宗教接近的倾向。从聚类结果来看,似乎“郑文”最接近原文,这是否说明“郑文”更忠实于原文?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三个译本的风格变异?

四、风格变异原因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发现三个中文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什么会出现变异?是否可以通过分析词性变化来解析风格变异的原因呢?

(一) 高频主题词分析

一篇文本往往集中表达一个主题,而这一主题通常借助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表示,因此,我们将这三类词性合称为主题词^{[29]95}。得到原文和三个中文译本的词表后,我们观察分析了这四个文本

中频率最高的 100 个主题词。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我们都能根据这些词大致推知该诗集的主题:“世界、人、心、爱、生命”。

《飞鸟集》虽为一部富含哲理的格言诗集,但作者注重对白昼、黑夜、溪流等自然现象的描写,将深邃的哲理赋予其中,让诗歌读来并不晦涩。这一点,通过其高频词表便可窥见一二。作者倾向选择音节数较少的常用词,如 love, death, said, joy, 而不是更考究的 affection, decease, expressed, delight 等。借助自由反叛、热爱生活的主题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泰戈尔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下面,我们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主题词,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对应的翻译在意义传达和情感色彩上是否忠实于原文。

原文中词频最高的实词为 world,出现了 41 次。该词既可表示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区域,又可表示一个人周围的环境。对应翻译中,“世界”出现次数最多,“郑文”为 44 次,“陆文”28 次,“冯文”31 次。“世界”表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事物的总和”^{[30]1320},与 world 的第一个意义相近。除“世界”外,“陆文”和“冯文”中还出现了很多其他译法。“陆文”包括“人世、天地、世间、尘世、大地、世人、地方、人间”,“冯文”则包括“现世、大千世界、尘世、世上、天地”。这些词都是“世界”的同义词,只是在表达的侧重点和情感上有所差异。“人世、天地、世间、人间、大千世界、世上”突出了人,说明人活动的空间,对应 world 的第一项意义;“现世”和“尘世”属于佛教用语,分别表示今生和人间。“世人”表示“世界上的人”^{[30]1321},强调的不再是世界这个整体概念,该译法对应的原文为:“the world loved man when he smiled”,其中 man 泛指“人”,因此这里译为“世界”应该比“世人”更合适。“地方”表示“处所;某一区域”^{[30]321},与 world 的第二项意义相近,“天地”可比喻“人们活动的范围”^{[30]1421}。这两种译法对应的原文为:“let me not put myself wrongly to my world”,这里 world 理解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为合适,因此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天地”或“世界”的译法。

另一个出现较多的主题词为 silence,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一表示没有声音,其二表示不说话、无话可说。“郑文”大多数情况下译为“沉默”,表示寂静或不说话,此外还有“默默、静悄悄、沉寂、静默、孤寂”等译法;“陆文”变化较多,包括“不知不觉、宁静、无声、无言、静思、万籁俱寂、静悄悄、隐约、不作声、深沉、寂静、没说、无声”;“冯文”的翻译有“寂寞、静寂、寂寥、安静、悠扬、静默、无言、默默”。这些词都可以表示没有声音,但仍存在些许差异。比如“静思”表示沉静地思考、省察,重在思考,而原文“in the dusk of the evening the bird of some early dawn comes to the nest of my silence”并不含有“思”这一动作,因此该译法似乎不符合作者原意。再如“深沉”表示“程度深”^{[30]1287},将 the night's silence 译为“夜的深沉”只强调了时间晚,安静这一意义要通过推断才可得知。“悠扬”形容“声音绵长而和谐”^{[30]1743},原文“The day, with the noise of this little earth, drowns the silence of all worlds”中的 silence 与 noise 相对,译为“悠扬”似有不妥。

第三个高频词 thoughts,表示一种精神活动,意为“思考”,或表示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意为“思想”。“郑文”除一处译为“颺”外,其他均译为“思想”。“颺”是一种文言用法,表示“凉风”^{[30]1368},和 thought 本义并不太相符。“陆文”中出现的有“思想、思潮、思绪、想法”。“思潮”表示“接连涌现的思想活动”^{[30]1367},对应 thoughts 的第一项意义;“思绪”表示“思路、情绪”^{[30]1367},没有强调精神活动的过程或结果,和 thoughts 表示的意义有偏差;“想法”表示“意见、看法”^{[30]1570},和第二项意义相近。“冯文”的翻译包括“心思、思想、念想、念头”。其中“心思”可表示“想法、念头”^{[30]1598},“念想”表示“惦念、想念”,“念头”表示“心里的想法、打算”^{[30]1071}。所以除“念想”外,其他词均含有思想之意。我们还注意到,译文中还出现了“忧思”、“忧虑”和“忧伤”,对应原文中的 sad thoughts,“忧思”意为“忧愁的思绪”^{[30]1742},“忧虑”意为“忧愁担心”^{[30]1742},“忧伤”意为“忧愁悲伤”^{[30]1742},后两者都只体现了 sad 而没有表示 thoughts。

通过以上三个实词的分析可以发现,“郑文”一般使用某一固定词汇对应一个英文单词,而“陆

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根据语境选择意义相近的词,或许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同时,避免了过多重复;但如果对原文意思把握不准,选择了不恰当词汇,则可能成为风格变异的原因之一。

(二) 各译本典型词汇分析

每个译者有特殊的词性使用偏好,也是造成风格变异的一个可能原因。对应分析通过分析由定性变量构成的列联表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将一个列联表中行和列各元素的比例结构以点的形式在一张对应图上表示出来,从而揭示不同变量各元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本研究中的定性变量为样本和词性,样本包含三个元素,即三个中文译本;词性包括 59 个元素,即表 1 列出的 59 种词性。将这些元素表示到一张对应图中,便可了解各译本的词性使用偏好。图 1 为对应分析的结果。圆圈表示译本,三角形表示词性,词性和译本距离越近,便表示词性在该译本中越具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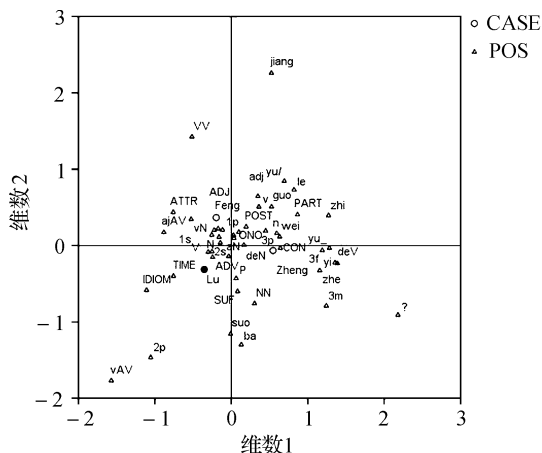


图 1 三个译本的对应分析图

由图 1 可见,每个译本周边都围绕着一些词性,其中“冯文”周边的词性最多,这表明虽然翻译同一原作,三名译者有不同的词性使用偏好。我们选择距译本较近的词性,探究各译本的词性使用偏好。表 4 列出了和各译本最有关联的一些词性。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具体语境分析这三个译本的语言特色。

表 4 中文译本词性使用偏好

译本	词性使用偏好
郑文	名词性语素、连词、“他们”、“的”、“为”
冯文	名词、形容词、形名词、状态词、拟声词、“我”、“你”、“我们”、“被”
陆文	动词、副词、量词、“得”

1. 郑振铎译本

由对应分析可知,“郑文”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名词性语素、连词、“他们”、“的”和“为”的使用上,这里我们选择连词和名词性语素,并依据相应的例句进行分析。

(1)原文:The night opens the flowers in secret and allows the day to get thanks.

郑文: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花在白天和夜里都是开放的,甚至有些花在夜间默默绽放,好让人们能在白天欣赏到它最美的姿态,但人们却很少去赞美夜为花朵做出的贡献。原文用 and 将夜的两个动作连接起来,郑振铎在翻译的时候,同样借助一个连词连接这两个动作,同时,他也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将原来的并列连词替换成转折连词。很多研究表明,汉语译文中的连词比母语中更常用^[26],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译文明晰化中所起的作用”^{[31]97}。对比三个译本可以发现,“郑文”除了忠实翻译原文中对应的连词之外,还会在一些地方添加一些连词以帮助读者理解。

除连词外,“郑文”的语言特点还体现在名词性词素的使用上。名词性词素指名词性的单音节词,这些单音节词在古汉语中可以单独使用,但在现代汉语中往往需要和其他字连用才能表达某种意义。该类词素的使用能让译本更为典雅^[32]。“郑文”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时白话文刚刚推

行,所以郑在翻译时自然无法摆脱古文的影响。

(2)原文:These little thoughts are the rustle of leaves; they have their whisper of joy in my mind.

郑文:这些微颺,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他们在我的心里,愉悦的微语着。

树叶的沙沙声本来轻得可以忽略,诗人内心的思绪也是如此,很小,却能带来愉悦。这里的“声”便是名词性词素,在现代汉语中通常和其他词素连用,如“声音”、“风声”、“雨声”等。除“声”外,译者还使用了结构助词“之”。“之”是定语的标志,“是从古汉语中沿用下来的一个结构助词”^{[31]143},在现代汉语中主要用于“四字格”。本句中“之”对应英文 of,用于定语 leaves 和中心词 rustle 之间,表示修饰关系。“陆文”和“冯文”分别译为“树叶的沙沙声”和“娑娑响的叶子”。“陆文”和“郑文”的处理方式相似,强调树叶发出的声音。而“冯文”却将中心转移到树叶,似乎没有传达作者的本意。

由此可见,郑振铎译本虽然平实,但一字一句完整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意义。译文风格和原著存在一些差别,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原文无押韵,译文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押韵。

2. 冯唐译本

“冯文”在翻译时多采用短句、多行,追求译文的押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想尝试翻译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凸显诗意境界的翻译方式,借助其富有节奏、韵律感和凝练的文字技巧,或许读者能从中读出他对泰戈尔诗歌新的理解和诠释。由对应分析可知,名词、形容词、形名词、状态词、拟声词、“我”、“你”、“我们”和“被”最能突显“冯文”特点,下面同样结合具体例句进行分析。

(3)原文: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冯文: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本句需要关注名词“裤裆”、形容词“绵长”和“纤细”。这是“冯文”中最具争议性的一句,很多人评论“裤裆”太下流,让译文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但冯唐本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郑文”和“陆文”将 mask 译为“面具”并不直接,因为在这一句中,泰戈尔实际上已经将大千世界比作一个人,在表达男女之情之时,揭下面具还不如解开裤裆更能让人明白它的意思,平常人不戴面具,但大家都有裤裆,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翻译方式。冯唐这样的解释我们觉得有些牵强,因为原诗本来就是以比喻的手法展现大千世界之爱,这里的 mask 自然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说明我们在爱人面前是没有遮掩、没有隐瞒的,这一面具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冯唐只将其理解为“裤裆”,可能违背了作者的原意。除这个词外,冯唐为了押韵,将“舌吻”和“诗行”调换了位置,并且加上了“绵长”和“纤细”作为修饰,这些似乎也不太符合原文的意思。原文强调的是“小”(small),强调在爱人面前,我们是微小的,是只属于对方的,同时也是永恒的(eternal),这两重含义在“冯文”中也未得到直接体现。

(4)原文: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冯文: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这一句也是读者吐槽最多的一句,大家无法忍受用形容词“骚”来表示 hospitable。姑且不谈翻译得是否准确,单就这个字来说,就不太符合原作风格。对泰戈尔来说,在作品中描写小草、大地、溪流等这些自然景物,是为了道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此句,作者表面是说小草装点了大地,实则强调再伟大的帝国、再了不起的将相若无小人物的衬托,也是一片凄凉。通过“冯文”中的“骚”,读者很难感受到这层意义。再看 hospitable 的含义,意为“殷勤的、热情好客的”,从这个角度

来看,我们认为冯的翻译也有失恰当。冯唐在译本结尾《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中说,“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所以,在他翻译的过程中,“一半的时间是在寻找最佳的押韵”^[33]。一味追求韵律而以牺牲原诗的本意为代价,这样的行为固然不可取,但如果能做到押韵、意境兼顾,将会让译作赏心悦目。这样的押韵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句中感受到:

(5)原文:The trees, like the longings of the earth, stand a-tiptoe to peep at the heaven.

冯文:树/大地的渴望/踮着脚偷窥天堂。

大地要如何告诉上天自己的思念之情呢?只有生长在土地中的树木最懂它的心,树木踮着脚尖凝视着上天,以寄托大地对上天的思念。这是一幅非常唯美、非常浪漫的画面,这样的画面自然要用优美的文字加以衬托。原文的描述没有过多的修饰,简单中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我们似乎看到一片宁静的森林,带着思念的目光仰望天空。相应地,“冯文”也相当简洁,一方面,译文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所有意义;另一方面,恰当的押韵更能突出画面的美感。

3. 陆晋德译本

从形式上看,“陆文”一小句一行,非常接近诗歌。但为什么聚类结果显示“陆文”和诗歌相距甚远呢?下面结合能体现其语言特色的动词、副词、量词和“得”来解释。

(6)原文: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陆文:假如你为了思念太阳而落泪/难道你没有错过群星吗?

天空下雨落泪,是因为没有看见太阳,接着副词“难道”表示反义疑问,表示在看不到太阳的同时,也无法看到星星。但人们只在乎太阳,却忽略了星星;只在乎伟大,却不关乎渺小。同样的一句话,“郑文”和“冯文”对应的翻译分别是“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如果因为思念太阳而终日哭泣/星星也将离你而去”。由此来看,郑和冯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如果因为失去某样东西就伤心不已,最后你只会失去更多。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承认郑和冯的翻译合情合理,但陆的翻译也并无过错。再看本句的措辞,“陆文”除了在形式上做了分行,使其更像诗歌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刻意简化表达和押韵。通读整个译本便会发现,“陆文”多是逐字逐句的意译,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聚类分析中,“陆文”和诗歌出现了偏差。

(7)原文:The grass-blade is worthy of the great world where it grows.

陆文:草叶/最是配得上/它所覆盖的大地。

在诗人眼里,草叶是大地上最好的装饰。和另外两个译本中的“无愧于”不同,“陆文”将 be worthy of 译为“配得上”。“得”本身没有任何实际语义,而是个补语标志,“用来连接两个词构成形容词性或动词性的偏正短语附着在动词后作补语”^{[31]143},从而起到结构明晰化的作用。和郑振铎一样,陆晋德在翻译时同样没有刻意追求押韵。

(三) 词汇丰富度分析

冯唐在翻译中追求简略化的表达,这一策略可能增加实词比例,通过高频主题词分析,我们发现同一英文实词“冯文”和“陆文”对应的翻译方式更多,这些因素是否会导致译本词汇丰富度差异,从而引起风格变异?词汇丰富度指文本中词汇使用的多样性,有很多测量指标,这里我们选择 h 点和 R_1 。将文本中的词按频数(记为 $f(r)$)从大到小排列,每个词对应一个序号(r)。以 r 为横轴,

$f(r)$ 为纵轴,将所有词表示在坐标轴上,若某点满足 $r=f(r)$,即为 h 点^①;若该点不存在,则选取两点 r_i, r_j (大多数情况下 $r_j=r_i+1$)并满足 $f(i)>r_i$ 和 $f(j)<r_j$, h 点为这两点的连线和 $f(r)=r$ 的交点。通常情况下,虚词的频数大于实词,因此排序多位于 h 点前。当然,可能有少数实词的频数大于 $f(h)$,这表明它们与文本的主题有关联^[34]。越多实词出现在 h 点前,说明该文本的主题集中度就越高。因此,通过计算 h 点,便可窥见译本风格。计算得到三个译本的 h 点,统计出现在 h 点前的实词及其所占比例,结果见表 5。

表 5 译本 h 点及 h 点前实词

译本	h 点	h 点前实词(按频率从大到小排序)	总频率
郑文	29.5	世界、人、心、爱	2.095
陆文	23	有、爱、人、世界	2.135
冯文	24	爱、世界、心、有、人、花、神、生命	4.416

由表 5 可知,“冯文”中出现在 h 点前的实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郑文”和“陆文”,而且总频率也大于这两个译本,这进一步验证了冯唐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凝练的原则,同时也解释了“冯文”在形式上比其他两个译本更像诗歌的原因。三个译本共同出现的实词“世界、人、爱”也是泰戈尔作品的主题:“宗教热忱,爱(母爱和泛爱),自由(为了人格尊严),自然礼赞和宇宙神秘感”^{[28]85}。

每个词的频数与总词数之比便是其相应频率,记 h 点前所有单词的累积频率为 $F(h)$,由于 h 点前除虚词外还包括少量实词,而一些虚词也出现在 h 点后,文本中所有虚词的累积频率大约为 $\underline{F(h)}=F(h)-\frac{h^2}{2N}$ (N 为总词数),相应地,所有实词的累积频率为 $R_1=1-\underline{F(h)}$ 。 R_1 不仅包括单现词的频率,同时也包括出现几次的实词的频率。因此, R_1 越大,表明文本使用的实词越多样。“郑文” R_1 为 0.665,“冯文”为 0.719,“陆文”为 0.716。这说明后两个译本的实词种类超过“郑文”,这和我们分析高频实词的使用情况是一致的。计算可知原文 R_1 为 0.639,虽然中文与英语的词汇使用上存在差异,但由此我们大致可认为原文的词汇丰富度与“郑文”更为接近。

五、忠实与文本接受度

自 1922 年郑振铎开始翻译《飞鸟集》,到 1956 年全文译出并出版,郑振铎最早将《飞鸟集》传入中国。他在译本序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陆晋德也在译本序中说,“诗句很短,含义又太多,实在不容易一目了然”。这些给译者的理解和表述都造成了困难。截至“陆文”,《飞鸟集》至少有十五个译本。“冯文”的出版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这些译本,也掀起一场关于诗歌翻译标准的讨论。

了解译者的创作背景、翻译目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评价。郑振铎是中国现代作家和翻译家,是“我国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第一人”^{[35]41},他在翻译《飞鸟集》时“对原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吃透了原文”,不仅“忠实原意”,而且“不拘泥于原文”^{[35]43}。作为《飞鸟集》的第一本译作,其受众是所有中国读者,译者的目的是向中国推介泰戈尔的作品。陆晋德没有受过系统的翻译教育,从事的工作也与翻译无关,平时只是出于爱好写点小文,正如他在译序中所言,开始读《飞鸟

^① 该指标由 Popescu 提出,用来衡量文本的信息集中度,参见 I. I. Popescu, "Text Ranking by the Weight of Highly Frequent Words," in P. Grzybek & R. Köhler (eds.), *Exact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ext*, Berlin: De Gruyter, 2007, pp. 555 - 565.

集》只想当作睡前读物，后来觉得好玩才开始翻译。冯唐则是一名诗人、作家，出版过不少小说、杂文集和诗集，这次受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邀重译《飞鸟集》。冯唐认为翻译没有所谓的金标准，所以他并不认为“信”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而针对别人批判他的译作充斥荷尔蒙的味道，不适合青少年，他也回应自己的作品并非为青少年而译。由此可以看到，三名译者不仅角色不同，翻译的出发点也不相同，由此造成了译作的差异。

“郑文”固然平实，有些表达也不够凝练，但基本上准确传达了英文原著的意思，而且在风格、韵律的把握上也没偏离太远。王宗炎曾说，“译文风格与原文不同，显然就缺乏忠实性”^[36]¹⁶，因此以忠实作为翻译评价标准，也就意味着和原文相似度越高的译本，质量也就越高。《飞鸟集》三个译本中，当属“郑文”最忠实于原文，因此历经六十年仍有广大读者。

六、结 语

《飞鸟集》原文是近似英文自由诗的格言诗集，是散文诗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其三个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发现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且三个译本表现出差异：“郑文”和爱情小说最相似，“冯文”和“陆文”最接近于侦探小说，而且三者均与宗教文本有差异。尽管三个译本均出现了风格变异，但“郑文”除爱情小说外，和诗歌最接近，这表明“郑文”发生的变化最小。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从本文采用的定量指标的变化否认忠实在其他方面对译者的影响，因为从高频词和典型词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译者都在尽力传达原文意义，再现原文风格。

之所以会产生最后的差异，是因为译者对忠实的理解有异。我们从高频主题词、各译本典型词汇和词汇丰富度三个角度分析造成风格变异的原因发现：“郑文”倾向选择一个固定表达对应某个英语词汇，而“陆文”和“冯文”则富于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可以让译文更为生动，但若选择不当则会导致原文意思或情感传达错误。借助对应分析，我们找出各译本的典型语言特征，并结合具体语境分析了译本的语言特色：“郑文”虽然平实，但基本能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运用名词性词素等富含古典意蕴的词，保持了原著风格。“陆文”同样追求表达的准确性，尽管在形式上尽量贴近诗歌，但在词句的选用上并没有注意诗歌表达的简洁凝练。同时，“陆文”和“郑文”一样，也不苛求押韵。“冯文”注重语言的简练，强调押韵，这一方面让“冯文”读来更具韵味，但另一方面，过度追求简练和押韵，使得译文在表达上和原文出现了偏差，一些不合适的用词也与原文风格有悖。另外，“冯文”的词汇丰富度高于其他两个译本，“郑文”的词汇丰富度最接近原文。

泰戈尔作品曾影响了以冰心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现代诗人，其译作的功劳当然功不可没。尽管有人批评郑振铎译本过于平实，其中也不乏理解错误，但历经六十年，郑译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不断有译者尝试重译，但仍难以取代郑译本的地位，这可能主要得益于郑振铎比其他译者在更多方面对忠实原则的践行。

[参 考 文 献]

- [1] 陈西滢：《论翻译》，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35—143页。[Chen Xiying, "On Translation," 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Correspondence (ed.), *Pap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894 - 194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4, pp. 135 - 143.]
- [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Chen Fukang, *Outlin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2.]

- [3] 黄忠廉:《达: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第34-39页。[Huang Zhonglian, "Expressiveness: The Spirit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eor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2016), pp. 34-39.]
- [4] 廖七一:《严复翻译批评的再思考》,《外语教学》2016年第2期,第87-91页。[Liao Qiyi, "Rethinking Critiques toward Yan Fu's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2(2016), pp. 87-91.]
- [5] 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中国翻译》2010年第5期,第13-18页。[Liu Yunhong & Xu Ju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s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Ac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2010), pp. 13-18.]
- [6] 罗选民:《解构“信、达、雅”:翻译理论后起的生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第90-93页。[Luo Xuanmin, "Deconstructing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fterlif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S1(2002), pp. 90-93.]
- [7] 常谢枫:《是“信”还是“信、达、雅”?》,《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第66-68页。[Chang Xiefeng, "Faithfulness, or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4(1981), pp. 66-68.]
- [8] 林钰婷:《深邃哲理的载体——〈飞鸟集〉修辞手法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第115-118页。[Lin Yuting, "Carrier of Profound Philosophies: Exploration to Rhetorical Devices in *Stray Birds*,"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No. 7(2011), pp. 115-118.]
- [9] 赵德远:《文学翻译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87-90页。[Zhao Deyuan, "On the Relativity and Absolutism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4(2000), pp. 87-90.]
- [10] 陶沙、张亚蜀:《忠实对等,形神兼求:诗歌翻译的理想原则——兼析李正栓诗歌翻译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12期,第56-59页。[Tao Sha & Zhang Yashu, "Faithful Equivalence, Emphasis Both on Form and Spirit: The Ideal Principle in Poetic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12(2008), pp. 56-59.]
- [11] 李正栓:《忠实对等:汉诗英译的一条重要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8期,第36-40页。[Li Zhengshuan, "Faithful Equivalence: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8(2004), pp. 36-40.]
- [12] 庄华萍:《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14-124页。[Zhuang Huaping,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All Men Are Brothers* and Her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2010), pp. 114-124.]
- [13] 张璐璐、曹依民:《比较文体学视域下的〈四世同堂〉与 *The Yellow Storm* 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42-146页。[Zhang Lulu & Cao Yimin, "An Analysis on Parallel Texts of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and *The Yellow Storm*: A Comparative Stylistic Study,"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2015), pp. 142-146.]
- [14] 韩南、段怀清:《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6-37页。[Han Nan & Duan Huaqing, "The Bible as Chinese Literature: Medhurst, Wang Tao, and the Delegates Version,"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2010), pp. 16-37.]
- [15] M. Baker,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Vol. 12, No. 2(2000), pp. 241-266.
- [16] G. Saldanha, "Style of Translati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in Translations by Margaret Jull Costa and Peter Bush," in A. Kruger, K. Wallmach & J. Munday (e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11, pp. 20-35.

- [17] M. Ji, *Exploratory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Lüdenscheid: RAM-Verlag, 2013.
- [18] 孙建成:《散文翻译的遣辞措意与风格再现》,《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第118-120页。[Sun Jiancheng, "Word Choice and Style Representation in Prose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2013), pp. 118-120.]
- [19] 健逸:《如何理解汉语译文的风格》,《中国翻译》1986年第2期,第47-51页。[Jianyi, "How to Comprehend Sty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1986), pp. 47-51.]
- [20] 张玉双:《论文学翻译中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矛盾统一性》,《中国翻译》2006年第3期,第28-30页。[Zhang Yushuang, "Contradiction and Unity of Translator Style and Author Styl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2006), pp. 28-30.]
- [21] 佚名:《莫借“翻译”行“篡改”》,《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5版。[Anon., "Don't Borrow 'Translation' to 'Tampering'," *People's Daily*, 2015-12-24, p. 5.]
- [22] J. Cuddon,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Chatham: W. & J. Mackay Limited, 1991.
- [23] D. L. Hoover, "Frequent Word Sequences and Statistical Stylistic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Vol. 17, No. 2(2002), pp. 157-180.
- [24] R. Hou & M. Jiang, "Analysis on Chinese Quantitative Stylistic Features Based on Text Mining,"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Vol. 31, No. 2(2014), pp. 357-367.
- [25] 黄伟、刘海涛:《汉语语体的计量特征在文本聚类中的应用》,《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年第29期,第25-27页。[Huang Wei & Liu Haitao,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Genres in Text Clust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No. 29(2009), pp. 25-27.]
- [26] Z. Zhang, "A Corpus Study of Variation in Written Chinese,"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8, No. 1(2012), pp. 209-240.
- [27] 刘宝珍:《簌簌微语,讽诵有得——简评〈飞鸟集〉》,《国外文学》1984年1期,第41-51页。[Liu Baozhen, "Evaluation on *Stray Birds*," *Foreign Literatures*, No. 1(1984), pp. 41-51.]
- [28] 彭端智:《不着泥土的痕迹 没有痕迹的足印——介绍泰戈尔的〈飞鸟集〉》,《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85-90页。[Peng Duanzhi, "An Introduction to *Stray Birds* by Tago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1(1982), pp. 85-90.]
- [29] I. I. Popescu, *Word Frequency Studi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 [30] 《当代汉语词典》编委会编:《当代汉语词典:双色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Editorial Committee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ed.),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31] 肖忠华:《英汉翻译中的汉语译文语料库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Xiao Zhonghua, *Research of Chinese Translational Corpu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2] 曹明伦:《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第12-19页。[Cao Minglun, "Some Tentativ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riter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2006), pp. 12-19.]
- [33] [印]泰戈尔:《飞鸟集》,冯唐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Tagore, *Stray Birds*, trans. by Feng Tang,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 [34] I. I. Popescu, J. Mačutek & G. Altmann, *Aspects of Word Frequencies*, Lüdenscheid: RAM-Verlag, 2009.
- [35] 克己:《郑振铎的翻译活动》,《中国翻译》1987年第2期,第41-44页。[Keji,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Practic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1987), pp. 41-44.]
- [36] 王宗炎:《介绍赵元任〈译文忠实性面面观〉》,《中国翻译》1982年第3期,第12-18页。[Wang Zhongyan, "An Introduction to *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by Zhao Yuanre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1982), pp. 12-18.]

The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and Stylistic Varia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Translated *Stray Birds*

Liu Haitao Fang 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countries brings more foreign works into China and in this process, translators play a vital role. At the same time, translation qualities are determined by various factors like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or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market requirement. Thus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which is especially tru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Among various assessment criteria,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put forward by Yan Fu in 1898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wing to the ambiguity of its definition, controversies and queries have been raised; however,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faithfulness" is a necessary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in transl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faithfulness" include faithfulness in word meanings, figure of speech, rhetorical devices, style, etc. In other words, any variation in those aspects can violate "faithfulness."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of "faithfulness" fall into two groups: one focuses on analyzing typical expressions, and the other places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emergence of corpus brings a new metho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tylistic variation has been found in translations with the help of corpora. But those studies usually use limited materials and improper reference corpora, so improvements are needed.

Stray Birds is a collection of gnomic verses written by Tagore and was published in 1916. The first Chines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Zheng Zhenduo in 1922, and since then several version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 publication of Feng Tang's version in July, 2015 reheated the discussion about which translation version is the best. Various opinions are expressed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understandings and thus lack of objectivity. Using FLOB and self-built English poetry corpus as English reference and also choosing LCMC and self-constructed Chinese poetry corpus as Chinese reference corpora,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ree questions: (1) whether the three translations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from the stylistic perspective? (2) if stylistic variation does exist, then what factors lead to the variation? (3)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ylistic variation and readers' acceptance?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original text belongs to poetry and stylistic variation does exist in all three translations; Zheng's translation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romantic fictions and it is also similar to poetry; Feng and Lu's translation is similar to detective fictions. The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has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o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three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owards faithfulness. Reasons for stylistic variation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1) Selecting thematic words with high frequencies in the original text, we find that Zheng tended to translate a word into one particular expression, while the other two translators chose several different expressions; (2) Representative linguistic features in each translation are extracted by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nd analyzed in their contex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Zheng and Lu expressed the original meaning exactly on the whole and the style of word usage in their translation conforms to the original text. Moreover, Zheng and Lu did not use rhythm in their

translations, just as the original text did. Feng also expressed the original meaning clearly on the whole; however, sometimes he emphasized on simplification and rhythm too much, so that he mistranslate some words and left some information untranslated; (3) Feng's vocabulary richness is the highest among all and Zheng's vocabulary richness is the closest to that of the original text. This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more similar the translation is to the original, the more acceptance it will get.

Cluster analysis an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vercome subjective features of assessment and thus provide new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faithfulness," this study has shown their vigorousness in evaluating poetry. In future research, they can be used to measure different genres to achieve more scientific and reliable results.

Key words: *Stray Birds*; poetry;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stylistic variation



“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专题研讨会 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浙江大学中文系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专题研讨会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于2017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十余家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开幕式、新书发布会和专题研讨会三个部分构成。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可先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浙江工业大学肖瑞峰教授和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分别致辞,重点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切入点,介绍了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传统、现状、特色和贡献,并对《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创获进行了点评。

新书发布会由肖瑞峰教授主持,分为嘉宾讲话、编辑寄语、作者感言三个部分。复旦大学查屏球、罗剑波教授,南开大学卢盛江、卢燕新教授,厦门大学钱建状教授,中国社科院陈才智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沈松勤教授,浙江大学卢向前、刘进宝、周明初、陶然教授等专家对该书的价值、体例及进一步拓展的期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由此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注重文史会通,要在材料实证的基础上注重理论建构和学理提升,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责任编辑徐迈重点介绍了本书作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从申报到编辑出版的过程。本书作者胡可先教授从感动、惭愧、激励和感谢四个方面回顾了著述过程,并感谢与会专家对本书撰写的指导和帮助。

下午的专题研讨会由查屏球教授主持,重点讨论“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内容架构和需要突破的问题。咸晓婷副教授就子课题“新出写本与中古文学传播研究”、孟国栋副教授就子课题“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学家碑志考释与研究”、屈玉丽副教授就子课题“丝路考古与文学关联研究”、武晓红讲师就子课题“考古资料与中古诗词名物研究”、胡可先教授就课题的整体进展以及今后需着重突破的重点和难点分别进行了汇报。查屏球、刘真伦、罗剑波、罗宁、卢燕新、范兆飞、王庆卫、韩松涛、宋旭华等专家还分别就文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如何进行合作研究,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写本时代诗歌传布的具体特征,如何融合文学、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最后,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并集思广益,共同推进了中古文学研究的进程。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徐枫及刘双庆编辑参加了本次会议。

(孟国栋 供稿)